



政法界代表委员热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 以法治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两会特稿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刘子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构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这些长期以来政法机关和广大干警履职尽责的工作重点,也是全国两会期间政法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

3月5日开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一个重要的议程是,审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多名政法领域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今天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就政法机关如何充分发挥好职能作用,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建言献策。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政法机关重任在肩。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杨蓉介绍说,目前,山西省的社会治理工作已形成涵盖省、市、县、乡、村、网格纵向治理渠道,取得以“三零”创建目标为结果的风险预测预警可视化成果。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用,打造集治理方式创新、网格制度创新、数据融合创新于一体的基层社会治理平台,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杨蓉建议用科技为社会治理赋能,推进大数据信息技术与网格化管理的创新应用,增强基层社会治理驱动力。

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人口、资源等要素向市域集聚,市域成为社会矛盾风险的聚集点和高发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院长李迎新认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市域”层面的落实,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充分发挥市域社会治理以点带面、以城带乡的作用,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李迎新介绍说,北京法院多措并举,着力在前端解决最直接、最现实、群众最关心的痛点,2020年,新收案件多年来实现首次下降,降幅达14.7%,市域治理成效初显。

用法治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两会观察

□ 马树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传统服务保障措施,为老年人等群体提供更周全更贴心的服务。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并做到不让智能工具给老年人日常生活造成障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自助点餐、网约出行、线上挂号等智能化服务逐渐普及,在给人们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一些不会使用新技术的老年人犯了难。去年下半年以来,媒体报道了多起老年人被数字鸿沟“绊倒”的新闻,无论是七旬老人冒雨去交医保却被告知不取现金,还是九旬老人为激活社保卡被银行工作人员拒绝,无不反映出一些老年人在智能化服务面前的无奈。本应由全社会共享的技术进步红利,却成了一些老年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马一德代表建议

全面完善专业化知产检察保护体制

□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马一德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司法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近10年来,我国建立起专业化、一体化知识产权审判体制,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不断完善,但知识产权领域侵权易发、多发和侵权易、维权难的现象仍然存在,知识产权保护还存在诸多难点痛点,知识产权司法改革正遭遇瓶颈,重要原因是知识产权检察保护的作用一直被忽视。

知识产权保护是加强知识产权全方位、全链条司法保护的重要内核,人民检察院在追诉知识产权犯罪、通过民事、行政、刑事、公益诉讼检

为了更好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李迎新建议,坚持预防为主,主动适应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健全社会风险分析研判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共治”“自治”相结合,发挥基层组织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推进工作做实做细。

“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首要任务,依法办案是检察机关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看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法治保障是重要环节和重要内容,检察机关应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以高质量的法律监督工作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找准检察工作参与市域社会治理的切入点、着力点和发力点,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平安中国上新台阶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战略之举,也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目标的强国之基。

2020年,内蒙古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6万件,判处罪犯3.6万人,全力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战,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的北大门,坚决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不仅关系全区各族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且事关维护国家安全和边疆安宁大局。”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崇仁说,内蒙古法院将严格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强化责任担当,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边疆安宁稳固。

基础稳则天下安。李迎新认为,人民法院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力量,应当切实发挥司法审判职能,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惩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全面提升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

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收官之年。3年来,政法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推动专项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厉莉建议,建立常态化机制,严防黑恶势力在专项斗争过后死灰复燃,注重线索摸排、群众举报等工作渠道的常态化建设与维护,建立涉黑涉恶工作常态化台账,做到有诉必应。

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影 响日益深刻,网络犯罪不断演变、迭代升级,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网络黑灰产业链,网络金融等犯罪行为增多,引发社会普遍关注。

“没有清朗的网络环境就没有线下平安、人民安宁。当前,网络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网络犯罪治理任务依然繁重。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机关将持续加大惩治力度,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一道共同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说。

社会矛盾综合治理

社会矛盾纠纷越在前端,其对抗性越弱,化解难度越小,解纷成本也越低。

“内蒙古法院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积极开展溯源治理,如翁牛特旗法院创新‘党建+多元’解纷模式,关口前置,触角延伸,及时就地解决群众诉求。”杨崇仁告诉记者,内蒙古法院不断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努力构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

通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等举措,尽可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弭在前端,是政法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解纷新需求的一项重要举措。

李迎新结合多年工作经验提炼出三点建议:要提升解纷专业化水平,深入推进金融、知识产权、家事等专业领域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完善相关诉调对接机制;提升解纷便民化水平,不断探索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升级版,健全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提升解纷智能化水平,推动现代科技与平安建设深度融合,提升司法大数据在社会矛盾综合治理中预测、预判、预警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努力将各类不稳定因素解决在萌芽阶段。

厉莉告诉记者,人民法院是诉源治理的重要参与力量,要结合自身职能定位,主动担当作为,立足审判本职,建立诉外纠纷诉内治理的思维,充分发挥判决的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推进纠纷诉外解决。

“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是新时代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坚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顾雪飞介绍说,近年来,河南检察机关实施“一把手”工程,成立三个中心,建立四项制度,“群众来信件件有回复”工作成效显著,成为推动积案矛盾化解,树立检察机关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注意到,调解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加强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议制定调解法,以立法形式确立调解的独立性、中立性、专业性、公正性等属性,依据民法典对各调解主体进行法律定性并予以规范,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贡献更多力量。

政法领域代表委员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起步之年,政法机关要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服务大局,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实现保驾护航,以法治力量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北京3月6日讯
制图/李晓军

两会访谈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王鹤霖

“两年来,贵州省不断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认罪认罚制度适用范围、程序规范,从宽幅度等方面完善机制细化举措,着力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促进全省刑事司法资源进一步优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统计,两年来,贵州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案54008件47340人,2019年9月,适用率突破70%,在非试点省份中最高。2020年适用率达到了88.04%,超过85%的刑事案件在检察环节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服判率达95.5%。

认罪认罚增添法律温情

2018年10月,谢某等两人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其间,二人自愿认罪认罚,主动赔偿被害人。最终,法院在判决中认可了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意见,分别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10年。

承办检察官收到案件后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家属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获悉被害人王某的母亲谢某系建档立卡贫困户后,结合脱贫攻坚专项工作要求,主动到谢某住处核实其家庭情况,听取其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告知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规定,耐心细致地释法说理,还函请控申部门对其开展司法救助。

“对于此类案件不能一诉了之,一判了之。”傅信平说,此案是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协商性司法理念等多种刑事司法理念融为一体的典型案例。检察官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与脱贫攻坚专项工作紧密结合,既有效惩治了犯罪,又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既加强了权利保障,又节约了司法资源,既体现出检察官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诉讼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又发挥了检察机关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职能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司法理念和刑罚观念变革,司法资源配置,涉及侦查、批捕、起诉、审判各个环节,涉及公、检、法、司等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贵州省检察院强化跨部门协作制度建设,联合省监委、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省公安厅等部门印发《关于贯彻执行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细则》,“一揽子”解决影响案件办理全流程的痛点,合力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

“贵州积极推动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努力使值班律师履职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建立一批法律援助工作室,指导不同类型案件办理,延伸普遍性、争议性问题的,增强指导性、普适性,案件办理质量大大提高。”傅信平说。

提升办案质量效率

2020年初,贵州省检察院专门召开检察委员会,全面听取全省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工作情况报告,提出一系列改进工作举措,明确“确保适用规模稳定的同时,加强规范适用,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提升案件质量、效果和效率”的工作思路。

近年来,贵州检察机关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推进,省检察院党组、检委会多次进行研究部署,统筹解决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将认罪认罚工作列为“一把手”工作来抓,坚持高位推动,压实工作责任。先后组织召开认罪认罚从宽工作专题座谈会、刑事检察业务研判分析会等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安排,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落实。

为强化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贵州检察机关严格执行《人民检察院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健全和细化认罪认罚案件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不捕不诉案件、重大敏感复杂案件量刑建议把关力度,细化认罪认罚案件全流程规范,加大常态化巡查、督查、评查力度,防止徇私枉法,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同时,省检察院组织开展认罪认罚案件廉政风险防控专题调研,对云岩区检察院进行“解剖麻雀”式分析,采取查阅卷宗、个别谈话等方式细致查找风险点,形成专题报告。

傅信平认为,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追求的两大价值目标,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不是权力而是责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担负的责任。司法责任制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改革,使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的自由裁量权得到很大拓展,也增加了检察办案的案件质量和司法廉政风险,贵州检察机关应当在接受监督中广泛汇聚民意,汲取民智。

化解矛盾依法可用尽用

2020年2月,罗某遭到谭某辱骂,二人发生纠纷,罗某受伤,经鉴定,属于轻伤一级。承办检察官仔细审查卷宗材料后发现案情并不复杂,目前谭某已离异,还要独自抚养3个孩子,生活困难,检察官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提出解决办法,多次到罗某家中释法说理,帮助他申请司法救助金,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岑巩县人民检察院对谭某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后,作出不予起诉决定。

承担主导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关键是要落实到办案中。贵州省检察院、各市(州)院及时研究部署,通报各地办案情况,工作进度,经验做法等认罪认罚从宽工作情况,全力推动制度落地执行。将认罪认罚适用率,“两提高,一降低”等认罪认罚工作评价指标纳入业务考核,充分发挥业务考核指挥棒作用,积极引导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案,有力、平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依法可用尽用。

与此同时,贵州检察机关积极组织参加各类业务培训和工作会议,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学习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认罪认罚工作规定,广泛开展业务培训,积极提升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参与社会治理能力,并邀请实务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讲授量刑操作。

傅信平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协调经济社会关系、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基层政权中发挥着缓冲和黏合的作用。贵州检察机关将进一步有针对性地细化制度规范,改进方式方法,深入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提升执法办案质效,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法治智慧和检察担当。



两会镜头

3月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式结束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中)第一个走上“部长通道”,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杨晋峰 摄

提升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参与社会治理能力
访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傅信平代表